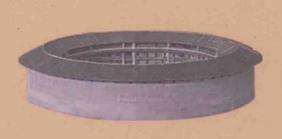
中国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

李斗石 译

省全心(1907-1917)



福建省全志 (1907-1917)

中国省别全志 • 第十四卷 福建省

日本东亚同文会 编纂 李斗石 译

延边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崔 军 封面设计: 金胜铉

福建省全志 (1907-1917)





定价: 260.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省全志(1907—1917)/李斗石 译.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634-7595-7

I. ①福··· II. ①李··· III. ①福建省一地方志一1907~1917 IV. ①K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6071 号

福建省全志 (1907-1917)

译 者: 李斗石

责任编辑: 崔 军

封面设计: 金胜铉

出版发行: 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址: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 133002

网址: http://www.ydcbs.com E-mail: ydcbs@ydcbs.com

电话: 0433-2732435 传真: 0433-2732434 发行部电话: 0433-2732442 传真: 0433-2733266

印刷:北京市通州大中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6 字数: 82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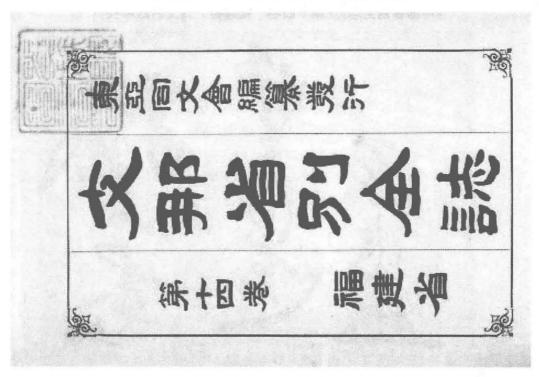
印数: 1000

版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4月第1次 ISBN 978-7-5634-7595-7

定价: 260.00元



《中国省别全志》(福建省卷)日文原版封面



《中国省别全志》(第十四卷 福建省) 日文原版扉页

火正九年一月二十日後 行大正九年一月十七日印 闢

水准銀譜 取器所有

古代表者 小 川 年 古 整 行 著 單 同 文 曾 著作者張 單 問 文 曾

徵來在政務院園整訊戶中七韓城

印刷者 佐久間假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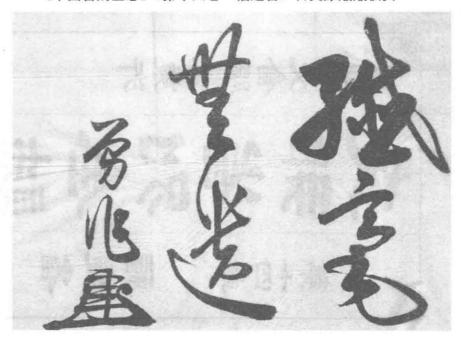
张保柜校勘阅阅舞廳舞中力排頭

印刷所奏奏奏令

酸行所

東亞同文會

《中国省别全志》(第十四卷 福建省)日文原版版权页



时任日本陆军大臣上原勇作题词: 纤毫无遗

译者序

日本东亚同文会于 1907—1920 年间,在东京编撰、发行了一部中国地方志,这就是全 18 卷《中国省别全志》(日文原名为《支那省别全志》),其中,第十四卷便是福建卷(1920年)。此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清末民国初期(1907—1917),福建省地理、城镇、经济、商业、贸易、物产、产业、交通、金融、度量衡等状况。

清末民初是中国正处于改朝换代、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备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的混乱年代。在这极其特殊的年代,官方和学者不仅无心也无财力修志。正如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小川平吉在《中国省别全志》序中所说的:"支那自古就具备地理书之国,上代有禹贡,汉有水经,历代连续记载史书和地理史,太平寰宇、大明大清之一统志等浩瀚之书籍举不胜举。然至近世,无完全之著述,殊乏记录现在之形势的书籍"。^①《中国省别全志》以及后来补充编撰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无福建卷),就是这种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由日本人实地调查,并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去伪存真,科学整理、编辑、印行的中国地方志。查阅福建省地方志,除厦门有《民国厦门市志》外,基本看不到其他清末民国初期的地方志。而这本《民国厦门市志》,经过民国年间三次组建编志机构多次修改整理,但还是无果,新中国成立后经多次修改整理,于1999年5月才问世^②,比《中国省别全志》晚80余年。《中国省别全志》问世已经有90多年,中国大陆只有几家图书馆(天津、辽宁省图书馆)收藏此书,除极个别学者外,无人问津,基本束之高阁。福建省地方志普遍缺少清末民国初期的史料,但似乎无人关注此部史料的存在,相关学者引用、评论这部史料的记载很少。

日本人编撰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大业"服务的。这部书深刻地 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就觊觎福建的野心,也是另一角度说明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有 力证据。在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将这部史料公布于众,有助于我们进 一步深刻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实现"亚洲共荣圈"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此书 积累了丰富的史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其比较科学的实证调查方法,精益 求精的编辑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日本人编撰《中国省别全志》的历史背景及对福建的调查

《中国省别全志》的编撰、印刷、发行者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其内容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深入中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后所提交的调查报告为基础编辑而成。《中国省别全志》全18卷,每卷1000页左右,涵盖除东北、内蒙(所谓满蒙)和西藏、台湾以外

① (日)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支那省别全志(福建卷)[M].1920:3

② 福建省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民国厦门市志.[M].方志出版社.1999.5.

的所有大陆省份。全部分卷如下: 1.广东卷、2.广西卷、3.云南卷、4.山东卷、5.四川卷、6.甘肃(附新疆、含宁夏)卷、7.陕西卷、8.河南卷、9.湖北卷、10.湖南卷、11.江西卷、12. 安徽卷、13.浙江卷、14.福建卷、15.江苏(含上海)卷、16.贵州卷、17.山西卷、18.直隶(含北京、天津)卷。

对于日本东亚同文会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术界早有很深入的研究,对其性质也有明确的定论。东亚同文会于 1898 年 11 月在日本东京成立,发起人是著名的"兴亚论"者近卫笃。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于 1900 年 5 月成立于南京,同年 8 月迁至上海,首任院长也是著名的"兴亚论"者根津一。"兴亚论"似乎不同于福泽渝吉等人的"脱亚入欧"论,主要主张以日本为盟主,与中国大陆合纵,与朝鲜半岛合邦,共同遏制欧美。他特别强调中日"同文同种"。时任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小川平吉在《支那省别全志序》中扬言:"日本和支那有数千年亲交之历史,其国家之间有唇齿辅车之关系,其人民属同文同种,相依相援,必定能共进文明富国之域。我东亚同文会兴起之目的,其实就是鉴于东亚大势,加深两国之交流,增进相互之福利,以促进东亚的隆运,推进世界文明之进步"。①但"兴亚论"与"脱亚论"是一路货色,对于亚洲各国来说都是极其反动的,二者互为补充,共同为侵略战争服务。

东亚同文会属于民间组织,东亚同文书院是私立高等学校。但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以及经费来源,毕业生的去向等方面考察,其性质并非纯民间机构,带有半民半官性质。有的学者认定为"日本侵华的帮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中国省别全志》福建卷中,附有时任日本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陆军教育总监上原勇作的题词: 纤毫无遗。这充分说明它是为军国主义效力的。

东亚同文书院对中国的调查可谓用心良苦。其计划之缜密,参与人员之多,调查范围之广,调研程度之深,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他们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贸易、商业习俗、地理交通、都市人情以及物产和产业等。时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在《支那省别全志序》中言及学生调查的情况:"自明治四十年起十年间,每年安排即将毕业的约百名学生,分数班,花费四月有余的时日,围绕上述问题,深入二十二个省及内蒙,跋山涉水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其间,他们栉风沐雨、苦心惨淡,连续数日风餐露宿,甚至多日未得一口饮料。有的徘徊于革命的战场,有的遇上洪水泛滥,也有时被土匪乡棍包围,有时深陷于瑶苗瘴疠之境,其危险艰辛的程度世人无法想象。投入二十万金,用人超一千人,写出调查报告达二十余万页"。^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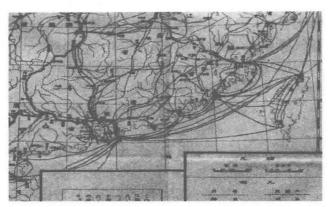
《中国省别全志》福建卷(以下简称《福建卷》),主要采用东亚同文书院学生于 1907年至 1917年期间,对福建省调查的数据和调查报告。据《福建卷》凡例,书院先后向福建省派遣八期学生,分别为: 1907年第五期(浙闽粤班),1908年第六期(赣闽粤班),1909年第七期(皖南闽粤班、汉口厦门班),1911年第九期(宁波厦门班、江阴厦门班、粤东班),1912年第十期(福建班),1913年第十一期(汕头长沙班、福建长沙班),1914年第十二期(福建广东班),1916年第十四期(江西福建班)。本书也采用了 1917年第

① (日)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支那省别全志(福建卷)[M]:1920: 2

② 周德喜.东亚同文书院始末.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4.5:7

③ (日)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支那省别全志(福建卷)[M]:1920:7

十五期学生的调查报告,这样实际为9期。第十九期学生于1922年编的对华调查报告汇志《虎穴龙头》中,附有十九期之前到中国调查的路线地图(参见插图),在此详细地标示了赴福建进行旅行调查的所有行程。^①



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第19期以前学生旅行行程略图(福建部分)

东亚同文书院给学生的旅行日志起个漂亮文雅的名字,并编印成旅行志。如第五期的叫《踏破录》,第六期《禹域鸿爪》,第七期《一日一信》,第九期《孤帆双蹄》,第十期《乐此行》,第十一期《沐雨栉风》,第十二期《同舟渡江》,第十三期《暮云晓色》,第十四期《风餐雨宿》,第十五期《利涉大川》。这些学生的旅行日志与调查报告手稿现存于爱知大学丰桥校区图书馆,2006年爱知大学编辑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旅行志》(发行:愛知大学,制作·发卖:雄松堂出版),收录了从第五期学生到四十期学生的所有旅行志。

笔者曾经在日本爱知大学(前身就是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留学。在这所大学里感受到很浓厚的"中国味",不仅中国图书多、中国留学生多、中国学研究很盛行,而且在中国学研究方面比较权威。每当 NHK 讨论中国问题时,在被邀请嘉宾里总是少不了该大学中国学教授的身影。据说,爱知大学丰桥校区原来是日本陆军某部的驻地,该部队也曾参加过侵华战争。二战结束后,上海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也随之解体,回到日本的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吸纳台湾和首尔帝国大学的教授和图书资料,成立了私立爱知大学,校址设在战败后闲置的陆军驻地。该校图书馆(丰桥校区)收藏着大量有关近代中国的图书文献资料,笔者也是在该馆看到了《中国省别全志》等文献。

二、福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如此执著地调查福建?福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到底处于什么样地位?在第一编第六章《福建省与台湾的关系》和第七章《福建省与外国关系》中,毫无隐讳地展示了日本觊觎福建的真实意图。

第一,从台湾角度考察,福建是对台防御的重要省份。在《福建卷》里,承认中日

① (日)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编.虎跃龙头.[M].1922

甲午战争后,日本逼迫清政府签署了《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群岛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的事实。在这里分析了台湾的历史,指出 "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关系。日本占领台湾后,住在厦门的日本人逐年增多,其人员往来日益频繁,福建与日本无论商业还是政治,其关系越来越显得重要。日本对台湾以及南洋的关系上,今后更应重视对于福建的研究。对台的防御,只有与福建紧密结合,才能实现其目的"。[©]也就是说,要加强台湾的防御,巩固台湾这个殖民地,必须先研究福建,搞好台湾与福建的关系,进一步实现福建与台湾一体化。总之,日本把福建研究放在日本对台湾与南洋关系的战略高度上进行考虑。

第二,从日本整体"兴亚"战略考察,"台湾海峡是日本西部以及朝鲜、中国东三省等地域防御的第一门户"^②。在此记述,1898年日本要求中国清政府保证不给外国人割让福建及其沿岸地带;尤其是美国与清政府交涉在三都澳设置美国海军基地的事情发生后,日本变本加厉,于1914年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不准其他国家在福建沿海地区设立外国造船所、军用储煤所、海军基地及其他一切军事设施,并于1915年5月25日获得中国政府的保证书。可见,日本不仅要完全吞并台湾,而且把福建视为囊中之物,还要在福建及其台湾海峡保持绝对的优先权,不准任何其他国家插足。

自 1895 年日本占领台湾以来,日本有意识地加强与福建省的经济、贸易、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往来。在《福建卷》里,记述了大量福建与日本的关系,在福建的外国人中,日本人占一多半,他们从事外交、教育、文化、新闻、商业、工业等各种行业;在厦门和福州的日本商业、工业企业逐年增多;福州、厦门和三都澳通商口岸的贸易主要通过香港和台湾进行,进口贸易也主要通过台湾输入大量日本商品。1907—1908 年间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全十二卷)第五卷介绍了福建铁路,第十卷介绍了福建的矿山,其他各卷都或多或少涉及福建。这说明,日本人对于福建进行有目的的考察和调查,始于 1903年以前。根据《对华回忆录》记载,日本东亚同文会在其成立的同一年,派遣中岛真雄创办了福州东文学社,日本创办的《民报》也始于 1897 年,并得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日本驻福州领事中村巍的帮助与经济补助。日本东亚同文会在福建创办的教育机构除福州东文学社外,还有泉州的彰化学堂(1898年)、漳州的中正学堂(1899)、厦门的东亚书院(1900),[®]都比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早,其目的是培养能为兴亚事业服务的中国人。

第三,从掌控整个中国大陆的角度考察,福建是与朝鲜、辽东半岛夹击华东、华北,进而挺进中西部,渗透两广的战略要地。"兴亚论"者提出的"日中韩结合"的论调,到了日本军国主义手里,实际就是变成"日中韩合并"。在此书发行的1920年之前,日本已经基本控制了朝鲜和中国东北。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从俄国人手里接管了旅顺口、大连湾以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等特权,俄国退出在东北亚地区与日本的争夺。1910年8月《日韩并合条约》签署,日本占领了朝鲜半岛。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代替德国接管山东半岛,向中国政府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逼迫中国政府"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转让他国",这当然包括福建。到1915年前,完成了日韩

① (日)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支那省别全志(福建卷)[M].1920:31—33.

② (日)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支那省别全志(福建卷)[M].1920:33.

③ (日) 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M].商务印书馆.1959

合并,初步掌控了中国东北以及山东,并实际完全掌握了台湾海峡以北的东亚海上控制权。下一步就是逐步掌控中国,进而实现日中合并。那么如何掌控整个中国呢?那就是,巩固台闽关系,铸就台湾海峡这个南大门,把台湾和福建建成北进浙江、西进江西、南进两广的重要军事物质基地。

三、《福建卷》的特点及史料价值

《福建卷》大 32 开(尺寸 22cm), 10 编 139 章,正文 1126 页,插图(素描和照片) 86 张,比例尺为 150 万分之一的福建省地图 1 张(宽 37 厘米×长 50 厘米),福州、厦门、三都澳大幅地图 3 张,泉州等地小幅地图 31 张,还有大量统计表,封面背景是福建省地图。

《福建卷》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福建卷》的调查重点突出,调查目的十分明确。

《福建卷》的第一个记述重点是城市。从地域角度来讲,考察的重点是以福建省福州、厦门和三都澳三个通商口岸城市为核心的福建沿海和闽江流域。从城乡角度来讲,重点考察 50 多个城市,暂时未涉及农村,但也没有涉及所有城镇,核心是福州、厦门、三都澳,其次是其他沿海城镇,再次是闽江流域的重镇,最后是其他十二个府城及其辖下的主要城镇,省略了永泰、崇安等认为无关紧要的城镇。

《福建卷》的第二个记述重点是经济贸易。以福州、厦门和三都澳三个通商口岸城市为核心,详细记述福建省的商业、贸易、主要物产、矿山、工业、金融、货币以及度量衡。

《福建卷》的第三个记述重点是交通运输。以福州—厦门—三都澳三点一线为中心,介绍了福建通往浙江、江西、广东的通路,以及省内的陆路、水路运输情况。

由此可见,对于福建的调查重点突出、目的明确,就是要全面把握以福州、厦门和三都澳三个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的福建省交通、经济、贸易、工商业、自然资源、金融等方面的概况。可以说,《福建卷》作为福州、厦门、三都澳三地清末民初的经济地理志、交通运输志毫无逊色。估计在那个年代福建无任何个人和团体乃至包括地方政府,从全局和宏观上全方位掌握福建全省的概况,更无人能详细掌握本地的细枝末节。然而,日本人却做到了,而且他们比福建人还懂得福建。到1945年战败为止,日本人已经全面掌握了福建省情况,笔者查阅第十六期以后的部分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旅行志,都有到福建的纪录。

(二)《福建卷》的调查方法科学,调查手段先进。

《福建卷》的调查和《中国省别全志》其他各卷一样,都采取了实地踏访的方法,旨在获取第一手资料。从 1907 年到 1917 年,十年间所派出的九支调查班,六十多人(旅行班合影中,一支旅行班成员四到五人,以此推算出),以福州、厦门、三都澳为中心,走访了 50 多个城镇,足迹踏遍了闽山闽水。

从记述的内容上看,他们拜访过官府官员,访问过海关,实地考察过居民、商贾、企业,每到一地都要亲自品尝当地的饮用水,并详细记录饮用水质情况,完全没有道听途说的印迹,据说调查报告考评时若所引用的数据无出处,就可认定为不及格。在调查过程中,虽然也用官方的统计表等数据,但他们没有直接拿过来简单引用,而是对此进行科学分析、逻辑推理。在人口的记述中,既有政府的统计数字,也有海关和警察署提供的数字。但是,他们根据当时情势的分析,判断上述数据的不可靠,并进行了推算。比如,关于福建省人口,报告列举了中国政府于 1902 年公布的福建省人口数为 2287.650万人,而 1911 年民政部公布的数字为 856.00万人,1909 年福建省居民户数为 78.0557万户,1910年为 237.9139万户,其差距非常悬殊。调查班根据福建省地势与居民分布状态,将 1909 年和 1910 年的户数加以平均,然后乘以他们根据居民分布等情况抽样调查后推算出来的 5.5 人平均每户人口数,得出 1911 年前后福建人口总数为 870万人,所以认为 1911 年民政部的数据比较准确。1995 年出版的《福建省志•人口志》中所列举的福建省人口数,1897 年为 2683.3万人,1912 年为 1584.93万人(缺 1898—1911 年的数据)。其来源是当时官方公布的数据,正如此书中所强调的那样,由于当时政局不稳,官方未能准确地调查统计人口,所以这个数据恐怕还是不准确的。

调查班所使用的手段,在当时来说很先进。从大量图片、素描、地图情况看,每班都配备照相机,他们已经掌握了测绘学、地理学、统计学等知识。而此时的中国还尚未形成测绘学、地图学等近代科学,更无这个方面的人才。书中附有的各地地图基本上是手工绘制的。《福建卷》上有一幅厦门地图,其绘制时间大概在 1911—1913 年之间〔书中标注,该部分是由第 9、10、11 期学生调查的,其时间跨度正好在 1911—1913 年间〕,范围除了厦门岛以外还有其附近的鼓浪屿、金门岛,地形地貌及其主要地点比较详细。《福建省志·福建省历史地图集》中的福建省历史地图,都是现代人根据历史记载重新绘制的,都属于现代版,唯有《民国时期厦门志》附有 1920 年代的厦门地图。二者相比较,前者时间更早,范围更广,地形更详细。《福建卷》上附有的福建省地图,恐怕是近代福建最早、最完整、最详细、最准确的一幅地图。

(三)《福建卷》的原始史料丰富,记述翔实。

在《福建卷》中,文字记述的内容,主要是城镇、贸易、商业、工业、物产、矿山、交通等情况,其中附带不少公司合约、公司章程,还有大量统计资料。另外,34幅手工描绘的地图和83幅现场拍摄的照片,还有手工描绘的素描3幅。这些资料随着岁月的流逝,其史料价值愈显珍贵。读了这本书,脑子里俨然形成完整的福建省轮廓,眼前浮现完整的福建交通地图。下面仅举几例,以供参考。

交通运输的记述内容中,除了概要性地介绍福建通往浙江的三条通路、通往江西的三条通路和通往广东的一条通路,以及省内的通道和邮政、电信外,很详细地记述了陆路和水路。如福州到厦门的陆路,分福州—福清、福清—兴化、兴化—惠安、惠安—泉州、泉州—同安、同安—厦门等6个区段,并且详细记述每个区段内所经过的乡村名称、乡村风情、区间距离、所用交通工具等情况。水路介绍福州、厦门、三都澳、泉州的海路和闽江水路运输的概况,在闽江水路中,详细介绍了闽江的三大水系及其沿江各主要

经济重镇以及城镇之间的距离,更详细记述了从光泽到福州之间的闽江水路情况,分十三段,每段都有详细的水文、沿途风情等情况的介绍。另外,还用统计表详细记述了主要港口城市的轮船、蒸汽船、民船的运输物品情况、装载吨位、运输费用、所需时间、发航时间等情况。其中,第六编第二章《漳厦铁路》,用6页的篇幅介绍了陈宝琛等人筹建铁路的情况,用统计表记录9个漳厦铁路火车站站名、距离以及火车票价,介绍了铁路沿线的状况、经营状况以及国有问题。更珍贵的是附有漳厦铁路的临时章程(节选)和两幅照片。而《福建省志•交通志》、《厦门志》、《民国厦门志》都没有如此详细,仅仅一页的篇幅,简略地描述漳厦铁路概况。

通货与度量衡问题的记述之详细也令人叹服,如福州的通货就有 5 种银两、7 种硬货币与 4 种软货币。度量衡,度有裁尺、京尺、平尺、鲁班尺;量有平斗、一平桝^①、二平桝、半平桝、南斗、二府桝、一府桝、半府;衡有平秤、红花秤、片秤、油秤、药秤、新议秤、钱秤。不同的"尺"长度不同,不同的"量"重量不同,不同的"秤"标准也不同。不仅地区之间(如福州和厦门)不统一,在同一个府内(如福州和福清)也不统一。如福州使用 4 种尺,厦门使用 5 种尺,福清使用 2 种尺,其中三地都使用裁尺,它的一尺分别相当于日本的 1.250 尺、1.025 尺、1.00 尺。

在第一编第五章,介绍了福建省海外移民情况。福建的海外移民分布世界各国,其人数仅次于广东,主要来自泉州、漳州、兴化和福州府管辖内的各县,有的地方整村人举家出国,每年通过厦门乘外国船出国的人数达八万人左右,还附有一张统计表,详细记载从 1886 年到 1917 年之间 11 个年份经由厦门的海外移民情况(移民目的地国家和人数)。还分析了出国打工的原因,指出出国打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贫穷,另外,福建人具有敢于冒险的精神。还详细介绍了福建人出国路径、主要移民国家、移民的年龄结构以及海外移民对当地经济、贸易、金融业的贡献。在此特别举福清的例子。福清自两千年之前就有海外移民,该县有家豪族,祖父时代移居南洋兴家,目前有五六十万财富,还在经营贸易。在日本长崎有个福清籍张姓豪族,拥有 25 万家财,主要经营砂糖贸易。福清的海外移民人数为 24,000 人,占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由此可推算福清 1890 年前后的总人口为 72 万以上),每年从海外汇过来的外汇达 60 万元,同时带动 46 万元本地花生油等土特产品的出口,搞活了本地的金融、产业、贸易,当地人称海外移民为福建的生命线。而在国内查不到这个年代福清出外华侨的人数,1994 年出版的《福清市志》(厦门大学出版社)明确记载:"明、清两代没有统计出外侨胞人数。民国时期,乡侨人数仍无可考"。

另外,不管日本人调查福建出自何目的,但其成果都是经过付出艰辛劳作换来的。 他们操持仅仅学了一两年的汉语普通话,在福建省这个错综复杂的方言区,踏访城市、 收集资料,其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调查班达不到目的决不罢休,一届接一届,每次 都在前一次的基础上有新的收获,内容有所扩展,深度有所升华,直到至善至美。他们 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孜孜探求科学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卷》的调查内容不包括名胜古迹,如:在旅行路线上也未列入

①"桝"是衡量液体和谷物的衡器,有木制和竹制之分,在日本"桝"相当于"升",1平桝=1斤四两,2平桝=3斤4两等。

崇安(现在的武夷山),更无人到武夷山;不少旅行班到过福清,关于福清的话题很多,但都未涉及石竹山的内容。另外,书中内容,还缺少官府、警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记述。《中国省别全志》号称全志,其名实不甚相符。

此外还想强调,《中国省别全志》的原始材料出自三年制专科大学三年级学生之手, 所使用的调查报告就是他们的毕业论文。在今天中国高校毕业论文的抄袭现象屡禁不止 的情况下,是否可大张旗鼓地鼓励学生到农村、企业、社区进行调查研究,获取一手资 料,以正学风。笔者曾经在高校教务处长岗位上工作多年,也主张调查报告可以当做应 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毕业论文,并鼓励学生进行调查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总之,撇开《中国省别全志》中的军国主义性质一面,其实里面还含有很多科学的内涵。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丰富资料,来补充福建省清末民国时代的史料之不足;我们也要虚心地学习他们的科学调查方法、先进的调查手段、追求科学的顽强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粪便是臭的,很多人遇上粪便会躲着走,但是农民把粪便收集起来沤成肥,施于庄稼,这样粪便就变成了黄金。我们对《中国省别全志》,既要批判其军国主义的性质,揭露其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服务的事实,同时也要善于吸取、利用其材料,并为我们服务。

此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著名剪纸艺术家吴文娟女士和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卢美松老先生以及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的热情支持和指导。他们的鼓励成为完成此书译稿的莫大动力。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此书谨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译者于福建省福清玫瑰园 2015年2月

《中国省别全志》原版序(一)

大哉亚细亚,面积 1700 万方哩 (4386 万平方千米[©]),生民数十亿。而其多数受制于欧洲,存独立国之实的只有日本和支那。岂不慨叹之甚,虽盛衰之运循环无极,然日本和支那两国提携发奋,努力发展文化,亚细亚之兴隆与复活未必无望。故两国的责任亦非轻。

日本和支那有数千年亲交之历史,其国家之间有唇齿辅车之关系,其人民属同文同种,相依相援,必定能共进文明富国之域。我东亚同文会兴起之目的,其实就是鉴于东亚大势,加深两国之交流,增进相互之福利,以促进东亚的隆运,推进世界文明之进步。而其创立以来,倾注全力进行两国缙绅之交际,子弟之教育,贸易之奖励,政治经济之调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设立其实也是其事业的一部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创立于明治三十三年,至今十有八载。期间我国各府县,选送俊优到上海,接受熏陶教育者已超一千人。每年夏秋之际,派即将卒业者到支那全土调查考察其形势,从山川城邑、人情风俗到物质之丰歉、交通之便利情况,无粗细遗漏。北逾黄河,渡阴山,西攀秦蜀峨眉之峰,南踏滇粤苗瑶之野,勇往迈进,栉风沐雨,几乎踏遍全省各个角落,积累调查报告,其数多达 20 万页。本书就是提炼其要,加进新的内容进行修订。支那是自古就具备地理书之国,上代有禹贡,汉有水经,历代连续记载史书和地理史,太平寰宇、大明大清之一统志等浩瀚无垠,举不胜举。然至近世,无完全之著述,殊乏记录现在之形势的书籍。对此内外人士均感遗憾。

本会编辑此书,不外乎补此缺漏,就是想尽力为支那研究提供便利,以应现今之急务。 若要至其大成,欲将期他日。

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百般之经世设施之基在于一处,那就是审度国土人民之形势。地理书之必要也实存于此。本书若有助于日支两国之亲善,有益于东亚文运之进步,此乃吾人之欣幸焉。

大正六年三月(1917年) 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长 小川平吉

① 译注:括弧中的平方千米是译者加的。

《中国省别全志》原版序(二)

禹贡九州之域,拥有九塞九泽八风六水,会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岱岳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谷桑麻鱼盐。以正德、利用、后生作为政治之三大纲领实施三礼九经。古往人文开明,百物丰饶,自黄帝以来五千年,民物之滋盛。至清朝之统宇,并八殥吞八纮。夏满蒙藏地之宽广至四百万方哩(1032万平方千米),人口之多四亿万。长江之水域八十万方哩(约 206 万平方千米),堪称大动脉,天下之宝藏,孰能与之相比拼。而且地表农产力有所增进,收获可达倍额,尚有余裕可得,地中五金博厚无限,至今尚处于无人顾及之状态。异日铁路纵横千里,若至咫尺时机,其富源之发畅足可惊世界。然而它将成为列强经济经营之角逐场,自今始可翘首以待。

不必多言,我国与中国在政治、经济上有着特别重要紧密的关系。更何况,欧洲战争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问题的中心。我国人士必须尽早熟悉中国国情民物,深谋远虑,决策于未然。古语曰,凡事不豫则不成,未雨绸缪。事物的经理运用以知己知彼为本。临阵磨枪,临渴掘井非智者所为。今日探明中国国情民物是我国人的一件急务。独感遗憾之事乃中国国情复杂、民物繁错,缺乏对此钻研之良书。我国与中国虽一衣带水之邻邦,精通中国之人士却极其鲜见。

敝院对此早已有所慨叹,并进行精心策划,对中国的地理、气候、人情、风俗、物产 以及政治、经济、教育和军事进行了仔细的探究,以图为中国的研究提供帮助。

自明治四十年起十年间,每年安排即将毕业的约百名学生,分数班,花费四月有余的时日,围绕上述问题,深入二十二个省及内蒙,跋山涉水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其间,他们栉风沐雨、苦心惨淡,连续数日风餐露宿,甚至多日未得一口饮料。有的徘徊于革命的战场,有的遇上洪水泛滥,也有时被土匪乡棍包围,有时深陷于瑶苗瘴疠之境,其危险艰辛的程度令世人无法想象。投入二十万金,用人超一千人,写出调查报告达二十余万页。

我同文会筹划编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命名为《支那省别全志》,梓刻印刷,公诸于世。大村学士担任编纂主任。该学士曾经在我书院任职十年,负责该项调查研究的课业,学问渊博,判定正确,尤其汉籍造诣极深,精通中国政治民物地理。他的著作《支那政治地理志》问世以来,社会评价极高。学士倾注全部心血,投入本书的监修。本书纲举目张、条理井然、周到详细、要点明确。我深信,此书的问世必将成为雾海之指南针,夜途之北斗星。

大正六年三月(1917年) 东亚同文书院长 根津一

《山国省别全志》原版凡例

一、本书的资料采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各期学生的实地调查报告。 其旅行班次如下:

1907年 第五期生 浙闽粤班:

1908年 第六期生 赣闽粤班;

1909年 第七期生 皖南赣闽班、汉口厦门班;

1911年 第九期生 宁波厦门班、江阴厦门班、粤东班;

1912年 第十期生 福建班、厦门香港班;

1913年 第十一期生 汕头长沙班、福州长沙班;

1914年 第十二期生 闽粤班;

1916年 第十四期生 赣闽班。

二、本书的编纂,以山崎长吉为主,成员有松本良男、中村桃太郎。

三、本书所使用的中国货币,很难确定与日本货币之间的汇率。 大体上其比价如下:

一元(又称弗)=日本一元左右:

半元(又称五毫、五毛、五角)=日本五十钱左右;

双毫(又称双毛、二毛、二角)=日本二十钱左右;

半毫(又称半毛)=日本十钱:

仙或分(十铜元一个或十文)=日本一钱左右;

文(制钱一个或铜元的单位)=日本一厘左右。

海关两的年平均比价如下:

1910年 一两 = 二志八片十六分之一十五 = 日本一元三四:

1911年 一两 = 二志八片四分之二 = 日本一元三二;

1912年 一两 = 二志零片八分之五 = 日本一元四九;

1913年 一两 = 二志零片四分之一 = 日本一元四七;

1914年 一两 = 二志八片四分之三 = 日本一元三三:

1915年 一两 = 二志七片八分之一 = 日本一元二五:

1916年 一两 = 三志三片十六分之十三 = 日本一元五四;

1917年 一两 = 四志三片十六分之十三 = 日本一元九七;